

长城瞭望

问责落实才能担责落地

——坚持按纲施训实战实训系列谈③

■陈连兵

第72集团军对表新大纲强化依法治训,对训练督查发现的80多个问题挂号销账、逐一整改;南海舰队某支队探索单舰指挥机制,将出海训练的“加强力量”转为监察人员;火箭军5个督导组检查组分赴一线演兵场,深入展开军事训练监察……连日来,全军上下持续强化军事训练监察力度,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氛围日益浓厚。

有问责才会真负责。须知,战争中无“下不为例”,如果平时对训练中不知责、不负责、不尽责的问题视而不见,等失守街亭了再挥泪斩马谡,岂不晚了?只有着眼随时准备上战场的要求,聚焦提高能打胜仗的核心本领,将训练监察问责的鞭子举起来、打下去,该批评的批评、该曝光的曝光、该处分的处分,才能以责任严明、责任落地、责任倒逼来端正训练作风,助推部队战斗力实现跃升。

军事训练监察是军事训练领域的“执法队”,是依法从严治训的“纠察队”。训练活动进展到哪里,监察督导就延伸到哪里,这是世界一流军队的普遍做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训练监察机制逐步完善,方法手段更加多样,打破了军事训练“自我训练、自我检查、自我考评”模式,逐步形成“决策—执行—监督”闭环管理回路。这是我军军事训练领域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

新大纲中,将“训练督查制度”“奖惩问责制度”写入总则,以法规形式将这堵关口牢固地立起来。而军队建设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水平的提高,也为训练监察问责提供了技术保证。以监促训、以监促建、以监促训的良好局面,正在全军上下日益形成。

但不容否认,军事训练假、空、虚等

问题,在个别单位仍然存在。有的理解有偏差,把实战化等同于野战化、实弹化;有的步子迈得慢,训练满足于“攻山头”,考核只盯着“米秒环”;还有的消极保安全,危不施训、险不练兵。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是唯上唯考唯稳、守旧守常守成的思想观念在作怪,是对战士的生命不负责,对战斗力建设不负责,对未来战争成败不负责。

训练问责,得有“响雷之威”,必须“震慑常在”。要彻底根治训练领域的顽症痼疾,就应高举训练监察的利剑,对于那些指标软、内容旧、能力弱、形式虚、训练假、治训松等突出问题,对于那些保姆式实打、表演式教学、操场式战术、脚本式指挥等训练积弊,通过问题聚焦、问题牵引、问题倒逼、问题归零等来一次大起底、大扫除,推进实战化训练深入发展。

问责不能“一问了之”。查找问题、

曝光问题,最终是要解决问题。在“打板子”的同时,应当研究剖析问题的根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个病灶一个病灶排除,力求问责一次、整治一域,避免陷入“出事—问责—再出事—再问责”的怪圈,确保训练监察成果最大限度地向战斗力转化。

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领导干部作为抓实练兵备战的责任主体,如果总想着“别被问责”,境界实在不高;只有多想“如何尽责”,才是根本之策。必须常思国家安全威胁之患、常怀打仗准备不足之忧、常想肩负统兵责任之重,激发“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提振“一日不为、三日不安”的责任心,真正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长城论坛

“听力”也是战斗力

■王守伦

有一则故事。两人在嘈杂喧闹的街上行走,其中一人听到微弱的蟋蟀叫声,另一人却完全没听到。前者说:“你能听到什么,全在于你想听到什么。”接着,他从口袋中摸出几枚硬币扔到路上,尽管“钱声”不比蟋蟀叫声大,却有不少人转过头来。

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选择性倾听”。人们对于周围的声音,往往存在自觉不自觉的“过滤”,只留心感兴趣的、只听到愿意听的。而且,越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越有可能受此局限。他们会认为,自己足以判断什么值得听、什么不用听。但其实,灵活掌控“听觉闸门”的开与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意识的“选择性倾听”,不仅容易遗漏重要信息,还容易造成沟通低效。

众声喧哗中,听什么?如何听?这并非无足轻重的小事,对领导干部而言更是如此。1961年,刘少奇同志到湖南调查公共食堂时,就从一位农民“公共食堂不好”的“落后话”“反动话”入手,先后走访了11个生产队,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为解决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准确依据,最终由中央作出了停办公共食堂的决定。现实中,为什么少数领导干部不知如何与基层群众沟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领悟“听”的真谛,没有掌握“听”的技巧。

部队是一个战斗集体,官兵之间只有高效沟通,方能默契配合、增加胜算。然而,少数领导干部开展工作时,对“说”相当重视,对“听”却未加重视,造成单向度的低效沟通。比如,搞调研时,看似面面俱到,实则蜻蜓点水;搞谈心时,看似一本正经地边听边记,实则“你讲我的话,我想我的事”;至于开会、搞教育、作动员,更是“你听我说”多、“我听你说”少。因此,部分战士觉得意愿难以表达、问题难以解决,“说了也白说”“还不如不说”。

要解决这一问题,倾听者就应当克制“选择性倾听”,努力体会官兵的情绪和想法、理解官兵的意见和感受,真正听得见、听进去、听明白。比如,官兵对什么问题感到困惑?对什么问题吐槽较多?对什么问题欲言又止?尤其是那些大家想说又不敢说、说了又不全说的事,其背后可能正是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只有善于倾听,才能打捞出这些最一线、最真实、最迫切的“沉没的声音”。

有倾听才会有理解,才能高效沟通;有倾听才会有倾诉,才能拉近距离。带兵人练好“听”的功力,有助于赢得官兵的信任和爱戴,有助于提高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水平,有助于推动部队建设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听力”也是战斗力。

(作者单位:31604部队)



据报道,某连队不少官兵喜欢“自掏腰包”帮助连队搞建设。原来,该连将学雷锋活动纳入评比,有人因自费“做好事”而在评比中加分,引发官兵效仿攀比,给大家造成经济上的负担。经上级指出后,该连及时叫停这一现象。

这正是:学习雷锋做好事,正确引导莫跑偏。量力而行求实干,莫为加分添负担。

洛兵图 王庚文

玉渊潭

鹊噪未必吉,鸦鸣岂是凶

■魏寅

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记载,康熙年间,吴中大旱,蝗虫避天蔽日。飞蝗所过之处,粮食被糟蹋殆尽。某人家中庭院的椿树上,有一个乌鸦巢,乌鸦会早到晚叽叽喳喳,惹人厌烦。然而乌鸦会捕食蝗虫,唯独这一点让人喜爱。有人为此创作诗歌,“乌鸦啞啞高下翔,奋迅攫啄如鹰扬”“瞻鸟爱止在邻屋,爱之却弹将弓藏”。

在与人类关系密切的鸟类中,乌鸦算是名声很不好。它叫声沙哑刺耳,形象也不雅观,常被视作不祥之兆。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说:“乌鸦地上无好音。”再如“乌鸦嘴”“乌合之众”“天下乌鸦一般黑”等说法,都表达了人们对乌鸦的厌恶、蔑

视和排斥。

与乌鸦相对的,是喜鹊。一种说法称,世人厌恶鸦而喜欢鹊,所以称鸦为“恼鸦”,鹊为“喜鹊”。殊不知,鹊也未必总能带来喜事。《坚瓠集》记载,康熙年间,一个叫祝理美的人参加科举考试期间,适逢他的父亲过生日,家人摆好果饌为其父祝寿。忽然有两只喜鹊飞入中堂,各衔了一枚蜡烛而去。大家都以为,这是祝理美金榜题名的好兆头。没想到,过了不多久,祝理美的父亲无疾而终。另有一例,一个叫沈韩碑的太史,家里忽然飞来数十只喜鹊,把庭院中晾晒的东西全糟蹋了,还拔出养在花盆里的兰草。此后没过多久,沈韩碑就离世了。

正如一首诗中所示:“鹊噪未必吉,鸦鸣岂是凶。人间凶与吉,不在鸟音中。”所谓的“祥”与“不祥”,或许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当蝗灾来临时,乌鸦“奋迅攫啄如鹰扬”,帮助人们消除灾祸,当此之时,谁又能说它是不祥之物呢?而喜鹊带来灾祸的故事,虽有封建迷信的成分,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喜鹊未必总是祥瑞之物。判断善与恶,不能只依据形象是否可爱、叫声是否动听,更不能迷信道听途说,甚至反受其害。

以此类推,判断一个人怎么样,也不能被巧言令色所迷惑。现实中,有的人不肯埋头真抓实干、撸袖实干,而是

善于说漂亮话、做样子活,为的就是引起上级关注、吸引群众眼球。在他们看来,搭搭花架子、动动嘴皮子的事,既省力又出彩,何乐而不为?而另外一些人,较真硬碰指出问题、直言不讳提出意见,反而容易遭受非议和排挤。如果让前者受益、后者吃亏,就可能形成虚假漂浮的坏导向,造成以下媚上的坏风气,甚至让政令落空、政策走样。

宋代孔平仲的《孔氏谈苑》记载,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每向朝廷奏事,“多陈治乱,历诋大臣不法”,说的尽是些不好听的。因此有言官告他“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被贬职。后来元昊叛乱,范仲淹受命率兵讨伐,大获成功。试想,如果没有战乱,因“说话不好听”而遭受挫折的范仲淹,该如何赢回认可和尊重?如今,我们又如何避免范仲淹这样的人受到误解、诋毁和责难?

评价干部,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对那些说话“不中听却实用”,做事“不漂亮却实在”的干部,更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使用、褒奖。当他们受到排挤时,给予保护,为他们主持公道;当他们工作失误时,给予宽容,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当他们德才匹配时,给予大胆提拔使用。如此,才能让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蔚然成风,让不作为、装作为、乱作为失去市场。

八一时评

今天,是第二十三个世界读书日。一项关于阅读调查显示,“手机阅读”“在线阅读”成为越来越多国民的选择,“屏”阅读与“纸”阅读,日渐形成平分秋色之势。“屏”阅读丰富了人们的阅读介质与阅读体验,增强了阅读的交互性和及时性,对全民阅读的推广很有意义。但是,也有人将“屏”阅读与碎片化的浅阅读画上等号,呼吁多读书、少读屏。其实,只要能实现阅读的目的、找到阅读的乐趣,无论选择何种阅读方式,都无可厚非。与其纠结于读屏还是读书,不如反躬自问:今天,我阅读了吗?读了什么,读了多久,理解多少?

身处“读屏时代”的部队官兵,阅读的条件更优越、选择更多样、体验更丰富,并不意味着,阅读效果一定会更理想。恰恰相反,不少官兵正面临着阅读的困惑:在纷繁芜杂的信息海洋中,哪些是真的、有益的?在五花八门的电子读物中,什么是好的、有用的?

近日,一篇文章在朋友圈刷屏,其中有一些灰色的情绪表述。这样的网文,看似“替你看想”,实则为了博人眼球、搅动流量、牟取利益,除了制造焦虑情绪、渲染紧张气氛之外,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此外,有些格调不高的网络小说、品位低俗的网络段子、真假难辨的网络新闻,总能通过精心的包装,引起大家关注,甚至成为“爆款”。然而,这些搅乱三观、惑乱人心的东西,读得再多又有何用?

可见,“屏”阅读看似只需轻触屏幕、轻滑指尖,但要真正读出“正向效益”来,却并不容易。如果人家“推送”什么就读什么,随手“刷出”什么就读什么,看似获取信息很快、阅读内容很多,觉得很有收获、很有感触,实际上却可能是过目就忘、脑袋空空,或是让人情绪更加焦虑、内心更加惶惑、精神更加萎靡,甚至“整个人都不好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如果找不到“屏”阅读的正确打开方式,哪怕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会有什么有益的收获。

宋代的薛瑄曾说:“自有书籍以来,汗牛充栋之书日益多,要当择其是而去其非可也。”时至今日,可供阅读的内容,早已不是“汗牛充栋”可以形容。因此,更加需要“择其是而去其非”,精心甄别筛选。尤其是对部队官兵而言,工作节奏快、训练强度大,如果在阅读上不绷紧“择其是而去其非”这根弦,就可能让低质量、少营养、没价值的东西填满本就有限的阅读时间。只有树立明确的阅读目标、坚持正确的选择标准,才能拓展眼界阅历、增加思想深度、充实精神世界,实现阅读价值的最大化。

一支有学习能力的军队,往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官兵“认字就在马背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通过“战斗的学习”,一点点积蓄胜利的底气。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是血与火的对抗,更是知识与人才的角逐。从这个意义上讲,每名官兵如何对待阅读和学习,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关系未来战场胜负的大事。我们若想战胜对手,就应找到阅读的正确打开方式,与对手来一场学习上的竞争。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政治工作部)

基层心声

报情况关键要实

■冷宇

有基层官兵反映,机关让基层派遣公差时,往往将人数“向上取整”,理由是“方便基层安排”;机关检查基层卫生防病工作,习惯将就诊人数作为讲评依据,搞得战士“不敢生病”……这种对数字的“讲究”,其实是一种不严肃、不科学的做法。

曾几何时,部队工作“定性”指标较多,“定量”指标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引入“数字化思维”,立起各项工作的硬杠杠,有助于提升部队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然而,如果数字用得太多太滥,甚至搞脱离实际的“数字迷恋”,就可能反受其害。

比如,让基层出公差,明明三四个人就够了,非要凑一个班,难免造成人力浪费,扰乱基层工作;把“看病就诊人数多”等同于“卫生防病工作差”,罔顾

各个基层单位的实际,忽视战士个体之间的差异,就容易树立错误导向、掩盖矛盾问题。凡此种种,都是对“量化”的误解和误用。

“数字迷恋”的本质是一种形式主义,是工作不务实、作风不扎实的体现。纠正这种问题,关键要在“实”字上下功夫。尤其是在当前,基层建设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新旧职能过渡、新旧模式更替和新旧装备换代的特殊时期,亟需在理念、方式、机制等方面换挡升级。只有立起实的标准、明确实的要求、拿出实的办法,把“数字化思维”用对、用准、用好,才能提高工作实际效益,充分释放新体制活力。

(作者单位:火箭军工程大学作战保障学院)

不可“取媚于下”

■彭鑫鹏 刘雨航

通常讲的“取媚”,多是下级对上级的,可称为“取媚于上”;但也有一种“取媚”,是上级对下级的,也就是“取媚于下”。与前者相比,后者同样属于不正之风,应当引起警惕。

作为领导,固然应当关心爱护下属,但前提是讲原则、讲公心。现实中,个别领导把讨好下级当成一门“艺术”,遇到矛盾不睁眼、遇到错误不揭露、遇到问题不解决,只点赞不批评,只栽花不摘刺,还美其名曰“以正面激励为主”。

究其原因,无非是害怕得罪下级、害怕丢了选票、害怕影响升迁;或者自身本来就在问题,批评别人没底气、处罚别人不硬气。可见,“媚下”看似讨好下属,实则还是为了自己。

实际上,“媚下”未必就能“取悦”下属。有官兵反映,领导对自己提出“不错”“很好”之类的泛泛表扬,自己却难以感到鼓舞振奋。这类空话套话听得多了,反而觉得是在“被敷衍”。相较而言,大家更欢迎讲原则、明是非、有担当的领导,敢于指出矛盾问题,带动大家同向发力,把问题解决、把短板补上、把工作做好。

部队是要打仗的。带兵人如果当不严不心慈手软,姑息迁就,失之于宽,乃至对下属“不能使”“不能令”“不能治”,那就无法掌兵了。少存一己之私的“小九九”,多想带兵打仗的大事业,怀着育人助人的诚心对待部属,才能带出过得硬、响当当的好兵。